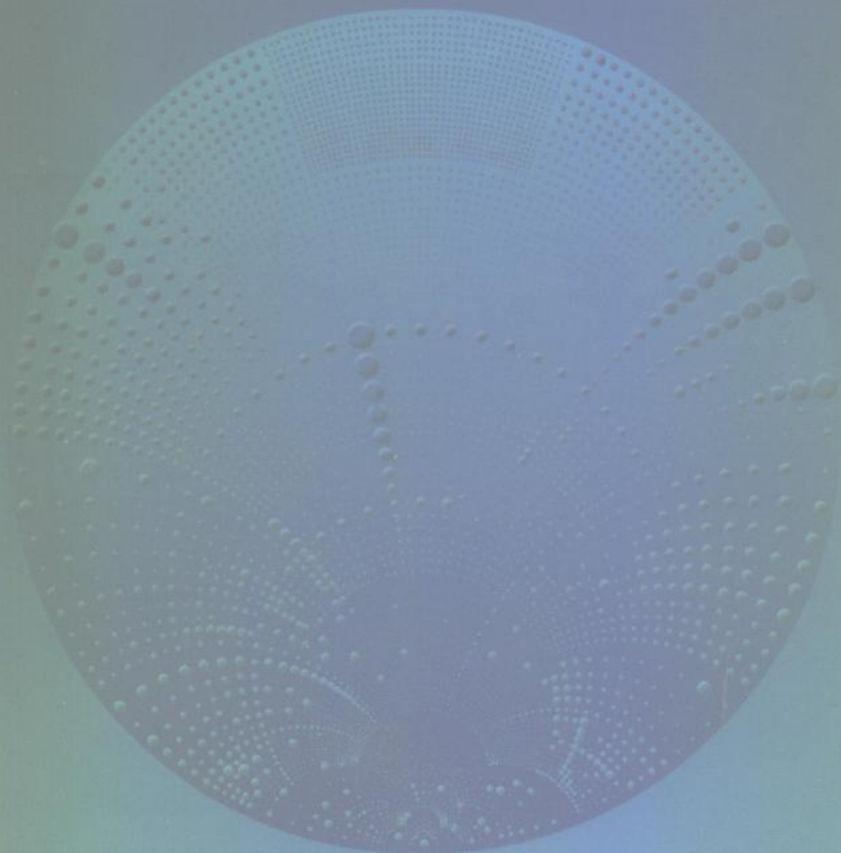


XINFAZHANJINGJIXUE

新发展经济学

(增订版)

主编 张培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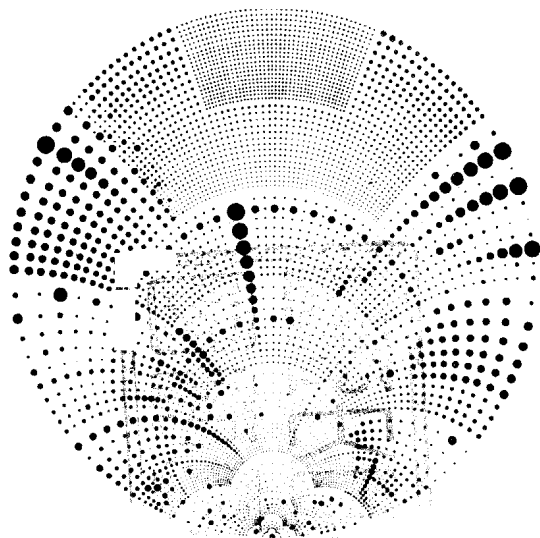
河南人民出版社

新发展经济学

(增订版)

主 编 张培刚

副主编 杨建文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发展经济学/张培刚主编. - 2版.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9(1999.8修订)

ISBN 7-215-02200-5

I. 新… II. 张… III. 发展经济学 IV. F0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377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南阳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4.125

字数 519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2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45.00 元

内 容 提 要

针对 80 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以及有些西方学者对这门学科的悲观看法,本书作者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出发,在借鉴和吸收以往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新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本书的主要特色,是将发展经常学的研究范围予以扩大,包括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并把发展中大国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锐意加以改进和革新,不仅从经济方面,而且从社会、历史、文化等非经济方面,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书中对战后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及前景,工业化之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工业化的含义及其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现代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转换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工业化的国际条件,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特殊问题和调节机制等重要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其中有些问题是以往发展经济学没有涉及或论述不详的。

本书是一部运用历史的综合的分析方法,首次试图建立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专著,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增订版序言

《新发展经济学》一书，自 1992 年秋问世，至今将届 7 年。中间曾重印两次。现在，此书又将重印，并以“增订版”的面貌，展现于 21 世纪来临之前。

此次，本书之所以增订扩大，其主要原因盖有下述诸端：

第一，就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自 1978 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连续 20 年的快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在 10% 左右。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即使在当今世界上亦属罕见。饮水思源，这当然要归功于总设计师邓小平及其有创见性的理论——邓小平理论。

但中国作为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文化历史悠久，而近现代又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发展中大国，为何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不长的时期内取得了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其主要原因安在？其中哪些是我国特殊情况造成，哪些含有一般意义，或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以充实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第二，1992 年秋冬间，在本书第一版已于当年 9 月出版问世之后，我国经过十四大讨论决定，明令采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实在是现代史上的一大创举。

原来,本书第一版于1991年撰稿时,在“计划与市场”一章中,已经把中国当代经济体制改革写到了从“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演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并力图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效地结合起来。可以说,当时作者已经把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到了“市场经济体制”门口。

时隔不久,1992年一二月间,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讲话时明白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这一论断,可说是前无古人、石破天惊的崭新思想,它对于我国在经济改革中冲破旧框框、采行新体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紧接着我国十四大决议明令采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理所当然,这要补充写进本书的增订扩大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市场经济,而又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为了避免或减轻这一重大的消极作用,所以我国决定采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按照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含义的这一具有指导意义的解说,不仅已用于本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着重号是引者加上的。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着重号是引者加上的。

一词中,也用于本书各章的有关分析里。

第三,自1997年开始出现的东亚或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广阔,影响深远,它不仅震动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且使全世界都高度警惕,严密关注。

曾几何时,二十多年来名闻全球的东亚“四小龙”或“四小虎”,从二战后的经济落后地区一跃而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其中除了原来的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外,还陆续加入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接连多年,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被誉称为“小龙”或“小虎”,成为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楷模。可是风云突变,1997年从泰国开始,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接踵而来,韩国、香港、台湾、日本亦随后波及,货币剧烈贬值,经济一落千丈,甚至转为负增长。

当此“东风无力百花残”之时,只有中国,虽然受到了影响,但却巍然未动,人民币一直未贬值,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快速增长。当然,我国维持到这一地步,也是尽了最大努力,甚至作出了不小牺牲的。

为此,我们将如何认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其起因和影响如何?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如何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本书“初始资本形成”、“外资利用”等章,特添设篇幅,除了充实原来的内容外,还专门分析和讨论了亚洲金融危机与经济发展的问题。

第四,就西方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来看,近些年来又有若干新的进展或新近提出的理论和研究课题。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知识经济”问题。

本书这次既是增订扩大版,自然要将这些新近发展起来的

理论或课题补充进去。具体而言,我们已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一章,添加了“知识经济的兴起”一节,并将这一章的标题改为“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兴起”。同样,我们已在“生态环境问题”一章,添加了“可持续发展”一节,并将这一章的标题改为“生态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第五,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客观经济状况的演进,以及有关理论或观点的进展,本书有些章节,也相应地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订和补充。例如,在“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一章,除了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节作了较大的修订和充实外,还特地添加了“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或企业家气质”一节,专门论述企业家的兴起及其在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现代乡村工业的兴起”一章,添加了“中国乡村工业的成就及展望”一节。在“通货膨胀”一章,除作了较大修改外,还添加了“稳定中实现经济起飞”一节。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人力资源的开发诸章,亦作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对于原来的“人口爆炸问题”一章,现将其研讨范围扩大,添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一节,并将该章标题改为“人口与就业问题”。

此外,如“工业化的限制因素”、“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诸章,亦各由原作者作了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其他还有一些章节,也在这里或那里作了若干小的更动或增补,就不在此一一列举。详见本书新添的“增订版后记”,载于书尾。

第六,虽说最后,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解本书《新发展经济学》之所以编撰和出版问世的由来,以及本书初步具有的中国自己或发展中国家本身的特色,特在本书增设“附录”,重新全文刊载我于1988年10月在青岛会议上所作的一篇学术报告,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

型发展经济学刍议”一文,以供参阅。读者如果在阅读本书正文以前,先读一读附录的这篇学术报告文章,则对于理解全书的旨意和内容特点,将会有所帮助。

本书增订扩大版得以在短期内出版问世,如同第一版一样,首先要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经济编辑处负责人张素秋同志,她对本书出版的关怀、筹划始终如一,这次尤甚,特此深表谢忱。谭慧同志对这次增订出版,事无巨细,一直关心协助,应当感谢。由于原版部分撰稿人,散处全国各地,联系不便,本书这次增订扩大,组稿、写稿、审稿,乃由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同仁承担。大家开会讨论多次,会上会下,集思广益,删繁补缺,酌句成文,费时良多,收获甚丰。除了署名撰稿人外,对其他同仁,亦应致以谢意。

张培刚

1999年3月,于武汉市

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原版序言

我们现在向读者奉献的这部专著兼教学用书，题名为《新发展经济学》，是一部探索性的试作，也是我们老少同仁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集体写作。读者或许要问：在国外和国内已经出版了多种“发展经济学”书刊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撰写这部著作？而且，为什么要在书名前面冠以“新”字？为此，我就借这个机会，谈谈个中的缘由。

简而言之，这首先要归因于我国在 70 年代末期推翻了“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采行的“改革开放”政策。

当我于 1978 年 5 月至 1979 年 9 月间，应邀赴北京参加编辑《政治经济学词典》、担任“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的编写工作，我得以重新与全国经济学界广泛接触。此时又适逢我国摒弃“闭关锁国”而改行“改革开放”，我才能有机会看到并阅读大量进口的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有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书刊，从而得知从二战后 50 年代末期以来的 20 多年间，“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西方茂然兴起，专著和教材接连出版，可谓盛极一时。从 80 年代初期起，我国翻译和介绍“发展经济学”以及有关“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书

刊，亦相继出现。

可是自后数年我又逐渐了解到，西方发展经济学好景不长。8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chman）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衰落》一文（载于美国《经济学季刊》1980年第2期）；英国经济学家拉尔（D·Lal）出版了《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1983年由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1985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重版）。迨至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教授，于198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召开的“第25届发展经济学年会”上，提出了《发展经济学：下一步迈向何处？》的学术报告。综观他们的意见，或说“发展经济学在兴盛一阵之后，已开始衰落”；或说“已濒于死亡的困境”；或说“发展经济学到了70~80年代，已经不像50~60年代那样繁荣昌盛，而是由高潮转入低潮，处于所谓收益递减阶段”。总之，发展经济学濒临困境，正在走“下坡路”。

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此种剧变——由剧盛转为剧衰，我始则颇感惊讶，继则又深感困惑：何其兴衰剧烈短促乃尔？！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得不促使我面向世界形势，结合发展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反复进行思考。我向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也向我国同仁，包括我自己，提出了极待弄明白并须迫切加以解答的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正有待于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有待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西方发展经济学竟然宣告“濒于死亡困境”或正在走“下坡路”呢？本来，二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在50~60年代的兴起，乃是顺应当时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刚刚获得独

立的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力图从经济上摆脱长期的贫困境遇和“依附”地位的这种普遍愿望而出现的。它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但除了极少数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有了显著的发展，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外，大多数则尚未转变成为工业化国家。可见发展经济学所担当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既然任务在肩，这个新兴学科又岂能遽然消亡？

第二，即使就二战后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极少数国家和地区而言，它们大都幅员较少，人口较少，例如亚洲“四小龙”，其中除了南朝鲜和台湾外，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城市国家和地区，缺少典型的农业特征。至于当今世界上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或是实行市场机制的印度、巴基斯坦，等等，虽然二战后三四十年来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和发展，但都还没有转化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这其中的原因安在？是否还有超越社会制度之上、或存在于现行社会制度之外的根本性原因，仍然阻碍着这些大国的经济发展？这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三，战后数十年来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除了个别学者或个别著作外，大都未涉及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而把研究对象几乎完全局限于实行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这当然是不够全面的，也是亟待补救和予以改正的。

根据上述几个问题，当时我个人认为，二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在兴盛了一阵之后转而陷入了当前的困境，并不是说明它已经圆满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而恰恰相反，

它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当今时代任务的要求而言，则仍然相距甚远。其所以造成今天陷入困境的局面，主要是由于过去发展经济学本身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和严重不足所造成的。因此，我认为发展经济学不仅不应该“趋于衰落”、“濒于灭亡”，而应该是任重道远，前途大有可为。但要做到这样，我进一步认为，应该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连同研究方法，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发展经济学”。

1988年10月，中华外国经济学会研究会华东分会在青岛召开，我应邀赴会，并怀着上述我近几年反复思考而得到的认识和初步设想，在会上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主要内容请参阅同名论文，载北京《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部分内容请见“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载成都《经济学家》双月刊，1989年第6期）。除谈了问题的缘由和来龙去脉外，我着重提出了要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也就是说，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进行改造和革新：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这里又进一步包括下列四点内容：

(1) 要以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不论它是实行市场机制的，还是实行计划体制的。当然，也要研究中、小·型的发展中国家。

(2) 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溯源。我认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发展问题，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而应当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

地进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从方法论上加强分析深度。

(3) 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订发展战略。就发展中的大国如中国而言，更应当顾及各个地区间在发展层次上的差别和不平衡，它们不仅具有“二元经济”的内容，而且体现了“多元经济”的特色。因此，在制订政策时，既不能使先进迁就落后，但也不能只顾“锦上添花”，而不照顾“雪中送炭”，以致继续扩大地区间的差别和倾斜度。

(4) 还必须看到，近些年来，有不少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国有或国营（大都为重工业、铁路和发电站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计划体制。另一方面，有一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如中国，已经引进了少部分的私营和个体成分，并且正在引发、培育和扩展市场机制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在新型发展经济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报告是1988年10月12日下午作的，当即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更没有料到的是，晚饭甫毕，我和老伴漫步海滨，片刻后回到宾馆房间，竟然发现黑压压地挤满了一屋子青年学者和好学之士；后来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也赶来参加。在青年学者、复旦大学博士生陈鸿仪（一年之后她被派往美国贝克利、加州大学进修）等人的组织和主持下，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听完我的报告，“受到了莫大的感染和鼓舞”；说我的发言“有理论、有感情，特别是对中国广大农民怀有朴实的挚爱”；说我提出的“新型发展经济学，实际上代表着新的方向，其目的是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使中国的学术研究能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大家谈得热情奔放，意气风发。最后，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我立即牵头，由晏协

助，组织力量，尽快根据新的意图和设想，撰写出一部“新型发展经济学”。时钟开始指向凌晨一点，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慢慢散去。

越半年，1989年6月至12月，我先后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家》两个刊物上发表了前述两篇文章，全国各地来信表示赞同和讨论有关问题的人日益增多。

1990年5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成都召开。十余位志同道合并以中、青年为主的教师和研究工作者，利用晚上聚会一次，初步讨论了撰写“新型发展经济学”一书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组织力量和确定进行步骤；提出了撰稿者要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两方面，认真阅读已出版的中外书刊，吃深吃透。会上还决定10月在武汉市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

1990年10月10~14日，正值武汉市的金秋季节，特地在华中理工大学校园举行了“发展经济学展望”研讨会议。会议代表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内蒙古和武汉市等地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实际部门；除极少数老年专家、教授外，绝大多数是中、青年学者。会上从三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而又诚心实意的讨论：（1）《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及现实意义；（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成就与不足；（3）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展望。在此基础上初步拟定了本书的“提纲”草案，大致上筹划和组织了撰写力量。会上最后决定年底召开一次会议，修订“提纲”并具体安排力量分工。

1990年12月18~21日，由保定市河北大学经济系主任杨欢进主办，在该校召开了落实本书编写任务的小型讨论会议。

与会者除我和杨欢进外，还有北京大学晏智杰、梁小民，上海社会科学院杨建文，南京大学陈志标，宁波大学石士钧，内蒙古大学刘建国等。会上明确了本书编写分工：总负责人张培刚、晏智杰，南方片负责人杨建文，北方片负责人梁小民。旋经反复讨论，会议修订了本书“提纲”，决定了各章的撰稿人，拟出了关于“撰写体例”的说明，并对时间进度作出了具体安排和要求。迨后晏智杰由于去德国访问进修，梁小民由于工作调动而新的工作岗位任务繁重，以致都未能继续参与本书的编写工作，深以为憾。

1991年4月底到5月初，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经由杨建文、刘建国的具体安排，本书部分撰稿人举行了一次短会，对“提纲”和撰写力量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并确定本书的主编和副主编由我和杨建文担任；北方片的事，由刘建国多加联系；南方片的事，由陈志标、石士钧协助进行。

1991年7月底到8月初，由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经济系主任许柏年教授主持、刘建国协助，在该校召开了“发展经济学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当时我刚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耶鲁大学、世界银行、贝克利加州大学等处访问两个多月归来，又风尘仆仆，匆匆登机，远飞呼市，参加会议。会后本书主要编撰人员举行了一次短会，除了讨论撰稿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外，并决定全书各篇章必须在1991年10月中旬以前完稿交齐，然后在武汉市统稿。

1991年11月2日到7日，统稿会议在武汉市华工校园召开。到会者就各篇章文稿的中心思想、理论观点和结构体例，进行了认真审理和详细评论。其中凡须作较大改动的部分，要

求散会后由原作者再作考虑，进行必要的修改或补充，一月之内完成交稿。河南人民出版社经济编辑处负责人张素秋同志，出席了统稿会议，并就撰写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具体要求。

最后的审稿工作，是从1991年12月中旬开始进行的。由于杨建文同志和我分别住在上海和武汉，因而我们只好采取两地分阶段兼流水作业式的方法，进行审稿、改稿和定稿。杨建文处于第一阶段，在两三个月内，他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审阅和修改书稿；初审完毕，就陆续将各篇章书稿寄来武汉。我处于第二阶段，从1992年2月中旬开始审阅，并从3月中旬起，由我单位徐长生、张卫东两位青年教师协助，抽出绝大部分时间，逐篇、逐章以至逐节地对文稿进行了最后的仔细的阅读、议论和部分修改，至5月下旬全书审阅告毕。在两阶段的整个审稿过程中，工作之繁重、琐细和艰苦，固不待言。

我之所以不厌其繁地将这本《新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渊源，及其撰写和定稿的过程，奉告给读者，乃在于说明：一件新事物的产生，特别是一种思想或理论观点的开端，该是多么不容易！即使是集众人之力，但要使各个人的成品，汇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是困难重重的。本书也只能说是开始朝这个方向迈步。

这本书能够在短期内出版问世，首先得力于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张素秋同志。她有胆识，有气魄，对工作积极部署，热情筹划，不遗余力，特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该社《新书周报》主编潘海同志、编辑陈亮同志，对本书的出版宣传给予了积极支持，亦在此深致谢忱。在撰写和定稿过程中，谭慧、郑乡明、黄敏等同志完成了不少的具体工作，也在此表示深切的谢